

“间接消耗战略”20世纪80年代 中国对苏联安全战略再考察

樊超 王珂

内容提要 中苏交恶造就了中国的反苏战备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由于苏联威胁难有定论,中国只得同时推进战备和经济建设。而苏联和越南的扩张刺激中国先后实施了外交公关和边界作战等措施,并形成了通过打击苏联的盟友来消耗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强力对抗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于是调整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即以“间接消耗战略”破解苏联的战略包围,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备战改为裁军。到1985年,中国决策者最终确认苏联威胁是有限的,并将安全判断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苏联为摆脱沉重的负担而约束盟友,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苏关系 同盟牵连困境 间接消耗 安全战略

* 樊超: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邮编:100037);王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邮编:100871)

**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研究(1977—1989)”(项目编号:18CGJ03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大学历史系蒋华杰博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1980年代,中国的安全政策上出现了两种相反但又并行不悖的部署:一方面,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中国连续进行两次百万规模的裁军,^①并于1985年提出影响深远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这意味着,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中国对外政策领域保持热度的苏联威胁议题有了定论或共识,即只有当苏联的威胁呈下降趋势,中国才具备裁军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不断强化针对苏联的安全部署。在印度支那半岛,1979年的南疆作战之后,中国在南部边疆进行了为期十年的轮战。在阿富汗,中国持续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依然担心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并为此在周边国家采取了长期的、有针对性的部署。两种不同的安全举措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应对苏联威胁时,会将安全战略重点从国土防御转移到周边间接的地缘博弈上?

尽管现有的研究本没有解答本文提出的疑问,但揭示出中国安全战略上的特征,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中国通过谈判解决“三大障碍”来破除威胁。^②这类观点的逻辑在于,中国采用外交谈判的和平手段解决了“三大障碍”。但事实上,中国的外交谈判并未收到成效,直到1988年苏联在“三大障碍”上妥协,威胁才解除。换言之,是苏联自身的行为决定了中国的安全前景,中国的安全努力并未充分体现。与上述研究路径不同,有少数成果注意到中国的安全措施:一是中国在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同时,“由过去侧重军事手段的运用,

① 潘宏:《中国百万大裁军及其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61页。

② 此类观点参见唐金权:《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论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页;廖心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第41页;何光浩:《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表现和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69页;薛力、肖欢容:《中国对外援助在柬埔寨》,《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2期,第26页;Edward C. O'Dowd,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The Last Maoist War*,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5-6; Odd Arne Westad and Sophie Quinn-Judge, eds.,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1972-197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54; Zhang Xiaoming, *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pp. 40-41.

转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①二是联合东盟国家反霸。^②

随着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依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助国际关系领域的同盟理论,中国在1980年代安全战略的新图景被描画出来。1980年代中国安全战略的变化,包括两条同时推进的线索,即中国逐步弱化对苏备战和逐步强化对苏联盟友的打击力度。这两个子命题是解答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关键,也是本研究要解答的核心问题。

一、冷战时期中国安全战略的逻辑与常态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与超级大国对抗产生的安全威胁,分作直接的本土威胁和间接的周边战略威胁。在处理两类威胁时,中国都遵循了先与对手正面交锋,之后再转变为破除对手地缘包围的顺序。而对抗本身试探出对手的政策底线后,则下调威胁等级,让应对方案回归至烈度较低但旷日持久的周边地缘博弈。中国决策者在确认苏联不会入侵中国本土之后,在安全领域开启了内松外紧的两种布局:一是开启裁军进程;二是将安全战略侧重点调整为应对苏联在中国周边的同盟体系:利用同盟牵连困境(alliance entrapment dilemma),通过打击苏联盟友来间接消耗苏联的国力,从而最终解除苏联威胁。

所谓牵连困境,是同盟困境的一种,指一国因“盟国的那些只能部分分享或根本无法分享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冲突”。^③ 具体而言,苏联的盟友需要依仗苏联的各类援助。当它们陷入与别国的对抗或战争时,苏联则需要加大援助盟友的力度,从而导致自身国力被快速消耗。中国正是利用苏联的这种困境,在周边地缘上消耗苏联的盟友,从而间接消耗苏联的国力。最终的结果是:国力的衰落使苏联失去了威胁力;为了终止盟友对自己的消耗,苏联收缩

^① 此类观点参见郭新宁:《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34页;金骏远:《中国安全挑战和大战略的演变》,《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1期,第19页;唐世平:《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30页。

^② 董振瑞:《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东南亚外交战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85页。

^③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Issue 4, July 1984, p. 467.

自身与盟友的对外政策。

直接消耗盟友从而间接消耗苏联的方案,可以被称作“间接消耗战略”,即综合运用外交、情报等手段,对苏联的盟友——越南和阿富汗进行直接和间接的长期军事打击,将其拖入长期的战争状态,导致两国严重消耗苏联的经济社会资源和军事资源。之所以被称作战略,是因为该项政策或方案具备了一项战略在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上的特性。该政策塑造了中国1980年代的安全战略:一是在中苏、中蒙边境和“三北地区”的战备工作转变为国内的大规模裁军;二是在印支半岛和阿富汗,对苏联的盟友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打击。后者既塑造了区域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又间接消耗了苏联。由此造成的影响也跨出中苏双边关系的内涵,外溢到中美关系、中国周边外交、地区局势乃至国际形势。中国动员的国家涉及整个东南亚、南亚乃至美日等大国。在地区层次上,中国缓和了与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在中亚、南亚、印支半岛建立了次区域的均势结构,更是将苏联模式排挤出这些地区,使市场经济模式在亚洲东部连成一体,为1990年代中国和亚洲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的反霸统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苏冷战的整体态势。

传统的均势理论或联盟理论,大多关注如何削弱盟友间的联系,即诉诸分化或瓦解同盟的方式,从而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但事实上,国际政治中也存在长时段内牢不可破的同盟。所以,如何削弱牢固的同盟则是均势理论和同盟理论面临的新课题。同盟的牵连困境为削弱牢固同盟提供了新路径:越是牢固的同盟,盟友就越可能连累盟主,从而消耗盟主的国力。由此导致的两个结果在于:盟主的威慑力与外交能力受限。最终,无论是因为盟主无力维系原有的援助而遭盟友抛弃,还是盟主为避免继续被拖累而主动终止结盟,同盟都将归于瓦解。当然,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间接消耗的思路没有成为决策者的首选。一方面,苏越扩张初显之时,中国先进行了较长时段的决策论证,对威胁的反应具有明显的应激特征,体现了安全决策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另一方面,间接消耗的思路和模式是在具体的对抗中逐步摸索和成熟的,中国经历了对越沟通劝解、外交孤立和军事消耗三个步骤之后,才塑造出成熟的“间接消耗战略”。

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再评估:从对华战争到战略包围

苏联成为中国的安全威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息息相关。中苏关系刚刚恶化时,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论战,并未出现安全纠纷。随着中苏交恶逐渐毒化了各个领域的关系,以边境纠纷为代表的议题逐步凸显。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使中苏陷入战略对抗境地,由苏联带来的安全压力一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急迫议题。从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不断评估中苏对抗的形势和前景,其核心议题包含两个并存的命题:一是苏联是否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二是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苏联是否侵华作为传统安全中最急迫的议题,一直是决策层最关注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判断也经历了明显变化。苏联战略包围在中国决策者眼中并不构成最急迫的安全威胁,它通常是作为判断苏联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辅助指标,是决策层研判苏联是否侵华或对华安全威胁的侧面依据。

1969年是决策层认为中苏战争风险最大的一年,有两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决策者探讨国际问题时,从务虚和战略的层次出发,关注“战争与和平”这类安全议题。1968年11月28日,信奉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论断的毛泽东认为,“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战争的可能性在迫近,“似乎是要打仗了。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国家”。因而开始与其他领导人、外宾频繁地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①1968年时,这些关切还主要是停留在对国际形势的宽泛讨论上,但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即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的“珍宝岛冲突”及此后两国的恶性互动,则产生巨大的刺激作用,导致中国领导人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与中国的安全联系起来。换言之,既然帝国主义有好战的本性,那么,苏联的对华威胁是否是苏联发动战争的前奏和表现?即苏联是否会入侵中国?

经过领导层连续、复杂的战略研讨后,毛泽东确立了战备的思路,这从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219、230页。

面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入侵风险的担忧。^①从此,战备成为中国对苏政策和安全政策中的核心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动向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中国从1973年开始就注意到在全球战略层次“苏联扩张势头的加强”,^②苏联不但在外交上包围中国,^③还不断“加强中苏边界的苏联军队”;^④另一方面,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两国第二次的边界谈判也未中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两国边界上再也没有发生武装冲突。^⑤总而言之,苏联虽恫吓不断但并未入侵。

这种情况部分地改变了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判断。1974年7月24日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姬鹏飞等人谈国际问题时,研判了苏联的战略动向:“我也不大相信苏联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我的看法,苏联就是声东击西,口里讲的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八十一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⑥苏联战略重心偏向欧洲,以及中国本身的战略体量,是中国领导人判定苏联不会入侵中国的依据。但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战争论”的信奉,以及苏联在1970年代开始的全球战略扩张在中国周边造成的包围之势,又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谨慎对待苏联对华战争的冲动或可能性。

上述判断和对国家安全的谨慎态度综合作用,塑造了国防政策中长期并存但又略显矛盾的两条脉络:中国领导人判定苏联入侵的概率较低,但同时又在积极战备。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决策者无法判定苏联威胁的准确程度时,采用了最高等级的安全应对方案,所以,两条脉络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下

① 牛军:《19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若干问题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61页。

② 《苏联向亚洲西部海湾地区加紧扩张 海湾沿岸和亚洲舆论揭露苏联同另一超级大国争霸海湾地区并进行控制和掠夺》,《人民日报》1973年9月5日,第5版。

③ 《东南亚一些国家报纸剖析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苏修摆设圈套扩张势力范围 亚洲国家反应冷淡不愿上当》,《人民日报》1973年4月24日,第6版;《印度一些议员和报刊舆论表示 不满苏联兜售“亚安体系”》,《人民日报》1973年11月27日,第6版。

④ 《〈东京新闻〉消息:〈苏联对尼克松访华采取的态度〉》,《参考消息》1972年2月22日第4804期,第2版。

⑤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41页。

来。这在客观上是因为中苏恶性互动的态势一直没有改变,在主观上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既没有突破“帝国主义战争论”的认知框架,也没有可靠的情报判定苏联在全球战略或对华政策上的意图。

事实证明,在苏联威胁难有定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积极战备的政策。但它的防御特性决定无论是对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还是削弱苏联的对华威胁,都难以产生直接的和实质性的作用。于是,在中美缓和改善中国国际环境之际,中国决策者又构思了一项新的安全方案。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就共同应对苏联威胁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了广泛联合美国盟国和其他欧亚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设想,将其归纳为“一条线”的战略构想。^①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谈到“一条线”的设想时,又延伸出“一大片”的构想,将广大亚非拉国家囊括进反苏统一战线。^②这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提出反苏统一战线的思路和倡议,其目的在于制衡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以便牵制苏联的战略威胁或压力。可以认为,“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已经体现了间接消耗苏联的思路。但由于中美在对苏政策上的巨大差异,该战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因而停留在政策设计的层次。尽管如此,反苏统战从此成为中国长期而坚定的诉求。这样,以军事战备为主,包括中苏边界谈判和反苏统战在内的外交手段为辅,构成了1970年代后期中国对苏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

1977年,中国新的领导层形成后,仍在安全政策上沿用这套框架:从国际战略的视角论证苏联的战争本性及其对中国的威胁,因此,中国同步推进战备和反苏统战,期待以此挫败苏联的全球战略布局。安全战略上的这种继承性与苏联在1970年代颇具进取性的全球战略态势息息相关。1970年代后半期,在中苏边界对峙没有缓解的情况下,苏联的影响力进入印度支那地区,强化了在中国南部边疆的战略存在。而中越关系的不断恶化使敌视中国的两股力量合流,更加坐实了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对苏联战略的判断:苏联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17-18, 1973, 11:30 p. m. -1:20 a.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p. 13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18页。

此时,苏联之所以被视作更具威胁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的战略部署日益迫近中国周边,形成近乎全包围态势。到1978年,随着阿富汗倒向苏联,在陆地邻国中,中国仅和巴基斯坦、朝鲜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二是倒向苏联的周边国家与苏联正式结盟,并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进攻性姿态,中越甚至爆发了边界冲突。结盟与苏联新盟友的反华政策呈现的同步性,使中国决策者认定苏联是其背后推手,并对苏联威胁的评估更趋严重,^①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安全部署也更趋积极。

1977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外宾时谈到中国的应对之法:“中国政府反对霸权主义,有三个办法:第一,有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破坏它的全球战略布局,打乱它的战争时间表。第三,不搞绥靖主义。”^②换言之,新领导层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是趋向严重的,因而,中国在外交和国防上正在倾注更多的资源应对苏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往判断苏联威胁时存在的困惑已经解决。在1977年底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强调延缓战争、抢时间的同时,也指出“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仍要积极战备,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③为此,1978年1月3—6日,在徐向前主持下,军委战略委员会召集了各军区、海军、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小型作战会议,讨论了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针的建议》。^④

从中国的安全部署来看,苏联对华战略包围首先引发的是中国决策层对苏联侵华的担忧,因而主要精力放在国土防御上。但事实证明,苏联一直未有此类举动,反而是在战略包围的框架下,苏联新盟友的反华政策日益严重。换言之,苏联战略包围的威胁反而压过了苏联可能侵华的威胁。这样,从1978年春夏之际,中国将安全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反制苏联的对华战略包围上。由

① 《邓小平同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上的讲话》(1979年3月16日下午);《我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行径 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干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1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③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255—256页。

此,破除或削弱苏联的联盟成为首当其冲的议题。

三、中国通过外交公关孤立苏联和越南

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国周边构筑的同盟关系主要分布在三个方向:位于中国北部侧翼的苏蒙同盟;位于中国南部侧翼的苏越同盟;位于中国西部侧翼的苏联—阿富汗同盟。苏蒙同盟对中国的威胁是挂靠在苏中边境对峙和苏联侵华的框架和逻辑下的。在三者之中,中苏边界对峙进入了一个相对固化和平稳的态势,这样,首先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关切产生重大冲击的就是苏越关系。

苏越关系的接近以及最终的结盟,在客观上使得苏联的战略部署直接贴近中国的南部侧翼,所以,中国将越南的对外政策视作苏联全球战略的延伸,是苏联从南部侧翼包围中国的战略部署。^①于是,中国积极运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及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打乱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其结果是中国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公关力度。可以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中苏关系在东南亚地区的延伸与争夺的结果。中国为应对苏联和越南,首先在东南亚地区构筑反霸统一战线。

在东南亚地区的反苏统战旨在恢复当地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这需要打击地区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更要先切断苏联的支持。因而,削弱苏越同盟就成为预防地区霸权主义的核心任务。中国的努力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争取越南远离苏联,即防止苏越结盟;第二个阶段是在美越结盟、争取越南无果后,中国开始围堵越南在东南亚的外交布局,构建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具体做法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越南争夺外交支持。争取对象既包括地缘毗邻、利益攸关的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域外的诸如美国、日本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

^① 中苏关系恶化至边界冲突后,中国就十分警惕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问题,目前最早可以查到邓小平对苏联包围中国的论述,可以追溯到1975年7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加什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谈到亚洲安全体系对中国的包围意图,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73页。在中越关系恶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参见《合众国际社主编史蒂文森报道: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客人》,《参考消息》1978年5月22日第7085期,第1版。

最初,中国疏远苏越的努力因受到国内政治的冲击而效果不佳。中越间的嫌隙从中美缓和之时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①1975年越南统一,由此也面临一个重塑对外政策的窗口期。但此时中国的对越政策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面对中越边界冲突造成的威胁,中国保持了克制的姿态。1976年5—7月,军方会同外交部、公安部连续出台了《关于正确处理中越边界纠纷问题的指示》和《加强中越边境工作的意见》,其核心精神是:从大局出发,“保持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坚持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主动惹事,压制一线部队动武的冲动;^②另一方面,刚摆脱战争的越南有两大需求,即经济援助恢复重建和外交支持实现印支联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给予积极响应,前者可能与“文革”后期频繁的领导人变动引发的政策波动或职能部门失控有关,^③也受国内经济困难的限制,而后者则是中国一直反对的一种地缘政治安排。这两项诉求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对越南倒向苏联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76年到1978年1月,中越双方在领导人和代表团访问、中国援建等领域仍有频繁互动,官方媒体也以积极口径予以报道,但貌似热烈的气氛下却暗流涌动。为解决两国间日益严重的问题,1977年6月10日,李先念与到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专门会谈,希望越方能努力解决高级干部反华言论、舆论反华倾向、挑动边界冲突、破坏中越铁路、南海岛屿归属、北部湾划界、迫害在越华侨等问题,此外,李先念还解释了中方无法提供新援助的原因。^④此次交涉的结果尚不得而知,但1977年11月21—25日,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从越方官媒的社论和此后的柬越关系来看,此次访华显然是双方补救双边关系的最后一次努力。^⑤尽管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和互动结果尚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判断,此次努力失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470页。

② 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7页。

③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3-274.

④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李先念副总理同范文同总理谈话备忘录》,《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第1版。

⑤ 《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说 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将巩固和发展两国友谊》,《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2日,第5版。

进入1978年,中国官媒对越方在柬越冲突中的报道,从热情洋溢的赞颂迅速变为不带感情色彩的铺叙。^①到5月份下旬,随着越南开始驱赶华侨,中越矛盾彻底曝光在各自媒体和国际舆论面前。^②中方认定苏联是背后的煽动者,^③实际上是从侧面坐实了苏越在对外政策上的同步性和关联性。进入6月份,中方在柬越冲突中公开支持柬埔寨。^④7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工程技术人员”。^⑤至此,双方的重大矛盾都已经暴露出来,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结束了预防苏越结盟的努力。由此,中国削弱苏联同盟体系的方法从防止结盟,转入第二个阶段即围堵苏越同盟的阶段。

早在中越矛盾尚未公开化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抵制苏联影响力的渗透。所以,进入1977年,中国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力度和接触频率。例如,通过领导人访问的方式,做周边国家的工作,防止它们倒向苏联阵营。^⑥从1977年底开始,中国加速了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触。^⑦在中越矛盾凸显的同时,中柬关系日益紧密。1977年9月28日,波尔布特率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极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⑧中越矛盾公开化和越柬冲突升级之后,1978年7月,民主柬埔寨副总理宋成率军事代表团访华,陈锡联副总理、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先后会见了她,同意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表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⑨

①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政府发表关于越柬边界问题的声明越南驻华使馆就越柬边境冲突散发一件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第5版。

② 《被越南驱赶回国华侨已达七万余人 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各级领导和各族人民热情接待、妥善安置回国的难侨》,《人民日报》1978年5月25日,第2版;《日〈朝日新闻〉社论〈中国和越南的对立〉》,《参考消息》1978年5月28日第7091期,第1版。

③ 本报评论员:《谁是挑唆犯?》(本报评论),《人民日报》1978年6月17日,第1版。

④ 《柬埔寨粉碎越南策动的政变计划 英萨利副总理指出,如果越南一意孤行继续侵略必遭更惨重失败》,《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5版;本报评论员:《越南当局为什么要挑起越柬边境冲突》(本报评论),《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第2版。

⑤ 《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 我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工程技术人员》,《人民日报》1978年7月4日,第1版。

⑥ 《日〈朝日新闻〉记者述评:〈邓女士访缅,对苏扩张采取先发制人对策〉》,《参考消息》1977年2月11日第6620期,第1版。

⑦ 《泰国〈曼谷邮报〉报道:华国锋总理邀请泰总理江萨访华》,《参考消息》1977年12月11日第6923期,第4版;《日报述评:〈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日益活跃盯住苏联而先发制人〉》,《参考消息》1977年12月14日第6926期,第1版。

⑧ 《外电报道:柬党政代表团抵京受到盛大欢迎》,《参考消息》1977年9月30日第6851期,第1版。

⑨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随着印支半岛的政治分野日益明晰,1978年后半年,苏联及其代理人的关系进入到制度化、集团化的阶段。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经互会。7月,苏联对金兰湾的经营日益活跃。^①由此,中国原本专门针对苏联的外交公关,转变为直接针对越南的外交公关,且逐步强化力度。凡是越南在东亚、东南亚的外交接触,中国都做出了相应的争取举措。1978年下半年,越南明显加大了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公关,总理范文同计划于9月份访问东盟五国。^②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建议邓小平也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并提交了《关于建议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请示》,7月15日,外交部的报告先后得到主管外事的李先念和邓小平的同意。^③从此时起,中国既加速了与苏联及其代理人的外交争夺,也开始在军事上防范苏越对柬埔寨的入侵。

除了对周边国家进行外交公关,中国还把外交公关的重点放在大国身上。1978年7月6日,越南副外长访问日本之后,中国也加速了与日本缔结友好和平条约的步伐。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与来访的日本外相园田直会谈时谈道:“用1—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不可能吸引并留住越南。中国不需要越南任何回报,给了越南20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也没有能把越南留在中国一方。1—2亿美元肯定不行。现在,越南到处伸手寻求援助,这是在苏联的指使下这样做的。……苏联唆使越南向外伸手要援助是因为苏联无法承担援助越南这一包袱。……苏联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是让经互会负担越南这个包袱。……我们就让苏联背起越南这个包袱吧。越南早晚会和苏联翻脸,如果让苏联背负越南这个包袱,越南会加快和苏联翻脸的进程。”邓小平还计划把这一想法讲给美国、欧洲东南亚各国,包括11月即将访问的马来西亚和泰国。^④这套设想实际上已经反映出邓小平反制苏越结盟的基本思路,即不再直接阻止苏越结盟,而是将时间点置于更久远的将来,通过孤立越南、加大苏越两国的负担来

^① 《外电评越南加入经互会》,《参考消息》1978年7月2日第7126期,第1版;《香港〈星岛日报〉社论:〈苏联建立金兰湾军港〉》,《参考消息》1978年7月10日第7134期,第3版。

^② 《外电报道:范文同将于九月访问东盟五国》,《参考消息》1978年8月21日第7176期,第1版。

^③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3页;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344页。

^④ 《园田大臣和邓小平副主席兼副总理的会谈(1978年8月10日)》,转引自徐显芬编译:《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日本档案(下):园田直日本外务大臣访华相关会谈记录》,《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2期,第131页。

间接消耗苏联,最终拆解苏越联盟。

当然,此时的“间接消耗战略”并未真正成型,而是具有两个过渡性特点:一是还只停留在拆解联盟未果后进行新尝试的阶段,仅是一种思路;二是间接消耗的思路尚不具备主动进攻的特性,主要是寄希望于越南扩张的负担拖垮苏联。换言之,间接消耗思路仅体现在外交领域,即劝说各统战对象接受中国的间接消耗思路,尚未延伸到军事等其他领域。此后,中国开始在构筑反苏和反越统战中不断推介这一思路,并逐步产生了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反苏和反越统战,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越政策和越南的国际环境。1978年5月,越南同美国政府秘密接触,试探美越关系正常化的问题。^①从美方的解密档案来看,中国一直了解美越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1977年初的时候还十分支持美越关系正常化,^②希望能以此争取越南。但随着中越关系的恶化,中国开始改变态度。首先,中国不希望美国攻击柬埔寨,以免造成美苏合谋的印象,尽管美方澄清这一声讨并不代表美国对越南冲突的态度。^③其次,在1978年5月访华后,布热津斯基认定中国极为关注越南威胁问题,因而他的助理奥克森伯格建议应该让美国国务院在政策表述中删去美国愿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内容。^④布热津斯基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当天据此向卡特总统提出建议。^⑤面对国务院不予配合的态度和行为,主张遏制苏联并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甚至在7月7日直接向总统谏言,国务院的做法失

① 《美联社报道: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奈特秘密访越》,《参考消息》1978年6月3日第9097期,第1版。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February 8, 1977, 10 a.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24.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22, 1978, 9:35-10:15 a.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353.

④ “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Washington, May 25, 1978,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465.

⑤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May 25, 1978,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470.

当,总统只能在中越之间选择一方,而中国更为重要。^① 10月3日,黄华在纽约与美国务卿万斯会谈时,向美方转达了邓小平与园田直会谈时的对越政策设想,^②即坚信援助的方式并不能实现争取越南的目标,转而想让越南成为苏联的累赘,从长远激化苏越间的矛盾。而美越建交则会给越南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减轻苏联的负担。^③ 这等于中方正式表示希望美方能停止援助越南、停止美越建交。

鉴于中国的上述态度,布热津斯基担心美越建交会损害中美建交谈判,因而于10月13日再次向总统建议,将美越建交置于中美建交之后。^④ 到10月中旬,卡特终于决定推迟美越建交。^⑤ 到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明确表示,只要越方还在侵略,美国就会竭尽所能地鼓励各国减少对越的援助,也不会讨论美越关系正常化。美国不但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对越,还增加对泰国的军事援助。^⑥ 可以说,对大国外交游说策略的成功,间接促成了对邻国外交游说策略的成功。1978年下半年,国际统战原则下的外交游说是中国“间接消耗战略”的主要内容,而随着印支局势的激化,“间接消耗战略”的内容进一步拓展和成熟。

四、中国通过打击越南间接消耗苏联

苏联的结盟行为意味着自身的战略意图需要依赖其盟友具体实施和操作。这样,中国在东南亚进行反苏统战的任务就蜕变为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

①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July 7, 1978,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508-509.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ew York, October 3, 1978, 6:55-11:55 p.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556.

③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U. S. -Vietnamese Relations,” November 21, 1978, pp. 1-2, National Archives,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CIA-RDP83B00100R000100090011-5.

④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October 13, 1978,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570.

⑤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页。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29, 1979, 5-5:40 p.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766.

主义。尽管从战略层次收缩为地区层次,但其斗争烈度反而升级了。中越之间的博弈,从最初外交维度的争夺,拓展为更为激烈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博弈,即反对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其博弈的冲突点最终落在柬越冲突的议题上。中国的间接消耗战略从外交游说拓展出军事消耗的新方式。

1977年7月15日,越南同老挝签署了有效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通过“保护和发展越南和老挝的特殊关系”,^①实现对老挝的控制。^②但越南对柬埔寨的控制反而酿成两国边界冲突,1978年初,柬越冲突升级为国际热点。到1978年5月份,中国已经明确,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寻求建立印支联邦和地区霸权,是导致柬越冲突的根源。^③1978年7月,随着中越矛盾的公开化,中老关系也迅速降温。^④中国在反对印支联邦问题上,唯一可以调用的外交筹码就只剩下柬埔寨。因而,柬越冲突成为柬越中苏四国博弈的焦点,而柬越局势则成为左右博弈各方对外政策的关键所在。

1978年9月,中国遏制苏越同盟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评估和作战方案被纳入决策议程。9月,总参召开“如何对付越军侵占我国领土”的会议,介绍了中越边境冲突的情况和越军即将入侵柬埔寨的新动向。这从侧面反映出军事行动的两个目标:一是安定边境,二是牵制越军对柬埔寨的攻势。而广州军区的作战方案也体现出这两个意图,即加大打击越南的力度,以获取和平建设的环境;在战略上牵制越军、配合柬埔寨。^⑤也就是说,越方将柬越边境冲突升级为入侵,是导致中方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11月3日,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⑥12月25日,国际舆论已经认定,越军对柬埔寨发起全面进攻。^⑦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方发起

① 《1977年〈友好合作条约〉》,《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3期,第80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May 20, 1978, 3:30-6:40 p.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419.

③ Ibid., p. 419.

④ 徐雅雅等:《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暨徐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368页。

⑤ 周德礼:《一个高级参谋长的回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243页。

⑥ 《共同社报道:〈苏越条约实质上是军事同盟的性质〉/时事社述评:〈越南完全纳入苏联阵营〉》,《参考消息》1978年11月6日第7253期,第1版。

⑦ 《美报专稿〈柬越战斗激起美对“代理人”战争的忧虑〉》,《参考消息》1978年12月29日第7306期,第3版。

出境作战,并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边境轮战,直至1991年印度支那问题得到政治解决。

此次军事行动给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了四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结果。

(一) 中国确立拆解苏越同盟的政策,并通过对越军事压力予以实现

如果说,此前的外交孤立策略是为了加大苏越两国的负担,最终拆解同盟关系,那么,直接的军事行动无疑加大了消耗苏越的力度。邓小平认为,既然终止援助都无法令越方收敛,那么,就必须在柬埔寨陷落前采取行动,否则,等越方得手,就会集中所有力量对付中国。^① 所以,军事行动是外交公关无法达成既定效果而产生的政策升级。军事行动加大对苏越的消耗力度,可以产生两个紧密相关的、可预期的效果。一是战略层次上的效果。中国的思路是:苏越被消耗的程度越大,苏越同盟就愈加不稳定,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条件才越加成熟。邓小平认为,越方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只要军事行动得当,就可以使越方的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因为越方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北方地区反对南方。^② 1979年7月6日,黄华外长向访华的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卜励德(Nicholas Platt)介绍了中国对印支的政策:凭借统一战线进行坚决斗争,国际会议或政治解决的时机尚不成熟,要让越南陷入柬埔寨的泥潭。^③ 8月27日,邓小平向访华的蒙代尔副总统解释道:政治解决的时机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越南的困境还不够深重,只有稍后等它的困难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它才会接受。^④ 中美双方都确认,越南已经面临窘境:老挝出现反抗苗头,军队陷在柬埔寨,南越地区离心离德,少数民族被迫害而外逃,埋头强化北部边界的军力,经济千疮百孔、已经崩溃,粮食商品奇缺。反击作战导致越军从不足60万扩编为100万,导致劳动力和后勤支撑严重不足,因而,只能依赖苏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29, 1979, 5-5:40 p.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769-770.

^② Ibid., pp. 767, 769.

^③ “Memorandum from Nicholas Plat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Washington, July 9, 1979.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898.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August 27, 1979, 9:30 a. m.-12:10 p. m.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942-943.

联每天提供的200万美元援助,1979年的受援总额达8.5亿美元。^①

基于苏越的上述困境,邓小平主张继续保持对苏越的高强度消耗:第一,必须对越全方位施压,继续加重苏联身上的负担,以此制造苏越之间的嫌隙,期望三到五年见效;第二,在战略上保持对越军事压力;第三,帮助团结柬埔寨国内各方,建立起抵抗侵略的统一战线。^②为增强柬埔寨抵抗越军的力量,邓小平甚至将军事援助给予流亡泰国的朗诺,助其回国抗击越军。^③柬埔寨作为抵御苏越军事扩张的第一道防线,因而也是中国反对苏越霸权政策的重要依托。

这一战略依托能否予以保全或强化,则有赖于第二个层次,即战役和地区层次的效果。军事打击可以牵制相当数量的越军,从而减少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压力。1979年9月,中国驻曼谷的武官告知美国驻泰国使馆的高级官员,中国短期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柬埔寨抵抗力量的生存,如果越军要摧毁柬埔寨抵抗力量或危害泰国,中国将再次教训越南。^④1980年3月份,赴美进行工作访问的副外长章文晋向美方通报,中国宣布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从而将大量的越军牵制在其北部边境,也使得民柬可以挺过越军的旱季攻势。^⑤随着战火延伸到泰越边界,中国竭尽所能援助泰国,包括向其船运自然资源;通过在中越边界牵制29个越军步兵师以减缓泰国的压力,并承诺,如果越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将与泰国站在一起。^⑥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August 28, 1979, 9:30 a. m.-no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947, 952.

^② Ibid., pp. 951-953, 954.

^③ Ibid., p. 955.

^④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eijing, September 20, 1979, 0710Z,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991, 993.

^⑤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cGiffert)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Washington, March 25, 1980, China Trip Follow-Up—Visit of Vice Foreign Minister Zhang Wenjin,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101.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okyo, July 10, 1980, 9:15-10:15 a. m.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arter and Premier Hua Guofe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122.

(二) 中国凭借自身的战略价值,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由此改善战略环境

军事行动凸显了中国在冷战中遏制苏越扩张的战略价值,意外地开启了中美战略合作。尽管卡特政府到1979年底仍在拓展对华战略关系上内部存在分歧,^①但这项课题一旦进入决策议程,将会对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走向产生暗示与塑造的作用。中美战略合作的开启,使得以“一条线”战略为核心的反苏统战向前迈进了一步。从此,中国可以更容易地借用美国的影响力,号召更多的国家一起遏制苏联及其盟友。

1979年1月29日,卡特总统向到访的邓小平表示,美国正竭尽所能地游说其他国家削减对越援助,不会启动美越建交,同时鼓励东盟国家团结对越,增加对泰国的军事援助。^②在次日的会谈中,邓小平要求美国借道泰国援助柬埔寨,并表示泰国已经同意并愿意将援助物资转运至柬埔寨。^③1979年3月23日,国防部长布朗专门给布热津斯基写去一份备忘录,表示急需拓展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并探讨了潜在的合作事宜。其中包括:在中方提出的合作援助柬埔寨抵抗力量的问题上,美国应给予泰国何种建议。^④这份文件从侧面说明,美国对中国反对苏越的统战工作,已经具有倍增作用。1980年3月份,章文晋副外长向美方通报,泰国已经准许乔森潘借道泰国自由进出中国。^⑤

1979年5月3日,卡特总统向柴泽民大使承诺,在影响越柬局势的问题上,如果有需要美日采取的行动,可以直接告诉国务卿万斯,卡特将和日本外

^①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December 13, 1979,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1017-1018.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29, 1979, 5-5:40 p. m.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766.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30, 1979; “The President Reporting 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Deng,”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772.

^④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Washington, March 23, 1979,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844.

^⑤ “Informa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cGiffert)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Washington, March 25, 1980, SUBJECT: China Trip Follow-Up—Visit of Vice Foreign Minister Zhang Wenjin,”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101.

相进行协调。^①8月28日,访华的蒙代尔副总统向邓小平提出,美国已经准备与中国、东盟密切合作,实现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保证其不结盟地位。^②中美间的战略磋商、政策协调涵盖了亚太地区相对广阔的地缘空间,中国的反越统战可以凭借这张外交网络,在更广的范围、以更高的效率,对苏越进行经济消耗和外交孤立。

(三) 中国经济战略推动着安全战略的微调

中国对苏联威胁的认识和以此为基础的外交战略,同改革开放政策存在着矛盾的一面。换言之,预防战争和经济建设在资源配置上存在排他性的需求,这种矛盾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外政策和国防两个领域。边界军事行动与改革开放是1978年底几乎同步出台的两项重大决策,也使这种矛盾关系更加突出。从理论上讲,改革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包含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证明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帝国主义战争论”展现的是一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世界大战可以延缓但不可避免。所以,改革开放最初面临的是一个动荡纷乱、需要同时应对战争的国际环境。当然,决策者也意识到这种矛盾需要得到逻辑自洽。边界军事行动结束时,邓小平指出:“为什么国际上愿意拿钱、设备,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强大了可以牵制苏修,假如你软弱,帮助你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③尽管上述逻辑将反霸与现代化统一了起来,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应对战争的策略,并未真正消解两者间的矛盾。

从国防战略的视角来考察,为防备苏联入侵而提出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方针,也同经济建设存在抵牾。“诱敌深入”的潜在影响在于,经济建设的成果会被将来的战争毁掉。^④改革开放后,军方开始研究和讨论这一命题,并最终在1980年10月份,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做出决定,将“积极防御、诱敌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y 3, 1979, 3:18-4:25 p. m. 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Chai Zemin,”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870.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August 28, 1979, 9:30 a. m.-no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p. 948.

^③ 《邓小平同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上的讲话》(1979年3月16日下午)。

^④ 张震:《张震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深入”的方针精简改为“积极防御”。^①这种调整只是在技术层次暂时缓解了安全战略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持续存在为决策层思考和调整安全战略提供了强制性的动力。换言之,中国是在与苏联博弈的过程中具备了调整安全战略的条件。一是从意图上考察,通过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及后来的阿富汗事件,苏联对华威胁的边际被描画出来,即对华威胁主要表现在周边地缘的战略包围上,而非本土入侵;二是从能力上考察,苏联对华威胁的有限性被揭示出来,而这与中国反霸的军事行动直接相关。

(四) 中国的军事行动揭示了苏越威胁的有限性

对苏联盟友的军事打击,会触发苏联履行对盟友的保护义务,其中最严重的情形是苏联进攻中国本土。所以,决策层在酝酿边界作战时的核心任务是预测、分析苏联干涉的可能性和中国的应对方案。作战结束后,邓小平对此做了回顾:苏联干涉可以分为大规模、中等规模、小规模三种可能。大规模干涉即苏联入侵且直取北京,但这“牵涉到苏联战略重点转移的问题,现在苏战略重点在西方,它的四分之三强的兵力布置在欧洲,所谓东面一百万人,占四分之一弱,而在装备上,主要装备更现代化、更重要的装备在欧洲。所以,如果要进行大规模向中国进攻,它的战略重点必须转移,起码要从欧洲调一百万人,这个来不及,我们行动时间不长。中央考虑,大风险肯定可以排除”。而美方提供的情报显示,当时只有43—45万的苏军驻守中苏边界,这确认了苏联仍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情况,也表明这些兵力无法入侵中国。而中等规模的干涉会在新疆、内蒙古或黑龙江以“起码两个集团军”“向我进攻”,但“很难设想就起那大作用。所以,中等风险一般也可以排除”。小规模干涉就是组织还乡团袭扰边界薄弱的地方。^②但事实上,苏联连小规模干涉都未实施。“苏联除在边境地区搞了一些演习,组织了一点海军舰只沿东海南下,摆出一点姿态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681页;张震:《张震回忆录》下册,第201页。

^② 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pp. 87-88; 《邓小平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16日下午;《共同社报道:邓副总理对共同社社长渡边的谈话》,《参考消息》1979年2月28日第7367期,第1版。

外,没有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①

对苏联威胁的判断过程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作战行动针对的是苏联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包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苏联对中国最主要、最迫切的压力是间接的周边战略压力,而非直接的侵略威胁。换言之,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是间接的战略包围与压力,而非直接的侵华战争。当然,中国决策者是在作战结束之后才正式确认了上述判断;二是中国决策层最终从理论和事实上确认,苏联没有侵略中国的能力。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试一试、量一量苏修”。^②事实证明,中国以军事手段回应苏联及其盟友的对外政策后,苏联并未履行保护盟友的条约义务,这反映出苏联不愿与中国发生战争。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威胁的有限性之后,显然增强了应对苏联及其盟友的信心。1979年8月28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蒙代尔副总统谈道:“无论是越南从南侧威胁中国,还是苏联凭借越南从南侧威胁中国,我们都不很在意。……如果苏联利用越南从陆路进攻中国,我们只能欢迎他们。我们完全了解越军的实力。我们只需要动员广东、广西和云南三个省。这三个省有近一亿人口。”^③

军事行动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安全战略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中国反对苏越同盟及其霸权的政策,中美战略合作的意外开启,极大便利了中国的反霸统战和间接消耗战略。换言之,中美战略合作成为间接消耗战略的重要支点和促进因素。揭示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说明中美双方的情报合作及苏联的真实反应证明了苏联战略上的困境,让中国摸清了苏联对华军事冒险的限度和威胁的有限性,也鼓舞了中国应对苏联威胁的底气和信心,为后续的中国安全战略提供了政策借鉴,并在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的激烈程度。

^① 《王尚荣关于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情况的报告》,1979年3月16日。

^② 《邓小平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16日下午。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August 28, 1979, 9:30 a. m. -no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p. 949.

五、中国安全战略从国土防御转为经略周边

无论苏联增兵阿富汗是否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对本就高度警惕苏联战略包围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这种军事存在验证了苏联的扩张本性和威胁,苏联的南下战略昭然若揭。^① 1979年初,中国在南部边疆刚刚间接回应了苏联的战略部署,苏联年底又把军力部署在中国的西部侧翼,既缺乏对华战略安抚或沟通,又未考虑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所需的政治氛围。从此,中国又面临一项新的安全威胁,并对此做出激烈的反应。1979年12月30日,中国强烈谴责苏联,“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将……为挫败苏联的侵略和扩张而进行不懈的斗争”。^② 1979年12月31日,中国副外长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谴责苏联的入侵行动,并推迟了两国国家关系谈判。^③ 1980年1月20日,中方指出:“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第二轮谈判在当前不适宜举行。”由此,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和中苏边界谈判全部中止。^④ 这标志着中国对苏缓和进程就此暂停,中苏间的外交渠道近乎断绝。除去双边范畴的举措,如何破除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的威胁,则成为中国决策者的新课题。

在1980年代之初,中国就面临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使决策者将反对霸权主义上升为与祖国统一、经济建设相并列的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⑤ 由此,中国强化了在周边消耗、应对苏联的政策及其力度。苏联侵阿之初,中国就开启了通过巴基斯坦、阿富汗游击队消耗苏联的进程。从1980年到1983年冬,中国每年都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签订援助协议,向游击队提供特定款式

① 《共同社报道:〈中国政府声明严厉谴责苏联干预〉》,《参考消息》1980年1月1日第7674期,第1版。

② 《我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行径 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干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1日,第1版。

③ 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7—948页。

④ 《苏入侵阿富汗威胁中国安全 中苏谈判当前不宜举行》,《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第1版;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百年潮》,2007年12期,第1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592页。

和数量的武器弹药。^①可以说,中国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由此也形成了独力推进“间接消耗战略”的局面,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反应很快改变了这一格局。

中美建交后,布朗、布热津斯基等人在推进中美安全、情报合作上,与国务卿万斯存在分歧,导致中美军事合作进展缓慢。^②但苏联入侵阿富汗转变了美国的对苏和对华政策,扭转了卡特的犹豫态度。1980年1月2日,卡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阿富汗和伊朗的局势让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借布朗访华的机会传递支持中国、对苏不满的强烈信号。^③1月4日,卡特给布朗发去访华指示:向中方提议就阿富汗问题进行高层磋商;秘密探讨中美协调援助巴基斯坦的方式,如允许借道中国向巴基斯坦空运和转运装备;美国准备让“巴统”的对华技术转让优于苏联;试探中方购买超视距雷达的意向,但暂不对华军售;邀请耿飚或徐向前访美。^④卡特将布朗访华目的设定为:扩展和深化美中防务安全关系,但不结盟也不达成任何正式反苏安排。协调关乎双方利益的政策,避免建立美国“一力承担”的双边关系格局。^⑤尽管卡特仍未大幅推进对华军事关系,但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迫切需求和对华合作,却契合了中国“间接消耗战略”的需要。

访华期间,布朗向耿飚介绍了美国的间接消耗的政策设想:设法增加苏联入侵的成本,以逼迫莫斯科罢手。例如,将阿富汗事件纳入安理会议程,贬损苏联的声望,动员盟友在外交上孤立苏联,提升其入侵的经济成本。耿飚则表示将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并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轻武器、药

^① Mohammad Yousaf and Mark Adkin, *Afghanistan: The Bear Trap*, New Delhi: Bookwise, 2007, p. 27.

^②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December 29, 1979, My Trip to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XII, 1028.

^③ “Minutes of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Washington, January 2, 1980, 1-3:25 p. m. Iran, Christopher Mission to Afghanistan, SALT and Brown Trip to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032.

^④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Washington, January 4, 1980, Instructions for the China Trip,”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034.

^⑤ Nicolas Platt, *China Boys: How U. 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gan and Grew*, Washington, D. C. : New Academia Publishing/Vellum books, 2010, p. 252.

品、棉服等物资。^① 1月8日,布朗向邓小平提议,双方应在阿富汗问题上保持沟通和一致行动。双方同意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和巴基斯坦。邓小平也介绍了间接消耗的思路:“对阿富汗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援助抵抗力量,中美应就此进行合作。但我要强调的是,此类援助不能只是象征性的。……我们必须用游击战将苏联长期拖在阿富汗的泥潭里。”^②两国在战略和策略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布朗访华的成功,除了在制裁伊朗、柬埔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分歧,^③中美就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危害等广泛战略议题达成高度共识,同意扩展两军交流与合作,同意美方飞越领空对巴基斯坦进行实质性援助。^④

布朗访华之后,中美就援助阿富汗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战略磋商。1980年5月28日,国防部长耿飚访美时,与卡特总统达成原则性共识:双方在印支和阿富汗问题上深化合作,美国负责动员自己的盟友,中国负责动员第三世界。^⑤此外,中国还帮助推进和巩固美巴军事合作。1980年7月10日,华国锋在东京与卡特总统会谈时,向美方传递了巴基斯坦希望获得美国援助的信息,并敦促美方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力度。^⑥

尽管双方的战略合作尚需成熟的工作机制来落实,但中国藉此告别了独力消耗苏联的模式,借助美国的影响力为“间接消耗战略”打造出更为宽广的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anuary 7, 1980, 9-11:45 a. m.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and Vice Premier Geng Bia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040.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anuary 8, 1980, 10 a. m.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and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1059-1060.

③ U. 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December 1985, pp. 78-79;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s Meeting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January 8, 1980, pp. 13, 15.

④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President Carter,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Claytor), and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January 12, 1980, 1630Z,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082.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y 28, 1980, 1:45-2:15 p. m. 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and Vice President’s Conversation with Vice Premier Geng Bi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1112.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okyo, July 10, 1980, 9:15-10:15 a. m.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arter and Premier Hua Guofe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1123-1124.

合作平台。此后,中美很快就开始合力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开启在情报、武器、后勤、战略协作等领域的合作。^①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积极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同时,不愿留下援助的证据,所以,到1984年为止,中国一直是这些武器的主要来源,提供从轻武器到反坦克武器、到防空火箭弹等一系列武器装备,甚至还有107毫米口径的火箭炮。到后来,中国的武器援助甚至到半卖半送的程度。为解决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后勤运输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专门在中国境内饲养骡子,然后经由丝绸之路将骡子运入阿富汗。^②

这些进展意味着中国的“间接消耗战略”在印支半岛之外又开辟出新的战场,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决策者对苏联威胁的担忧程度,以及为应对苏联威胁而做的巨大努力。具有戏剧性的是,阿富汗事件确实刺激了中国的安全神经和反苏统战,但“间接消耗战略”的顺利开展和外交环境的快速改善,让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决策者对苏联威胁和国家安全的判断出现了新的变化。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③应对战争的信心源于中苏战略天平的变化:一方面,中美建交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取得了重大进展。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中国拥有了对苏联进行战略核威慑的资本。^④从1980年9月开始,苏联的国际孤立境地和战略颓势已经显露出来,^⑤并开始影响中国领导人对安全形势的判断。10月25日,邓小平提到:“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我在一九七五年说过,五年打不起来。五年过去了,没有打。现在看,再有五

^① S. Mahmud Ali, *US-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 1971-198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75-177.

^② Ibid., pp. 83, 85, 109.

^③ 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④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0、979—980页;《合众社评论说:中国发射了一枚强大的火箭》,《参考消息》1980年5月20日第7812期,第1版。

^⑤ 《希报文章:〈阿富汗,波兰:苏联的“越南”〉》,《参考消息》1980年9月27日,第4版;《西方观察家说:苏联在阿富汗困难重重无法脱身》,《参考消息》1980年12月24日,第1版;《哈报文章〈1980年对莫斯科来说是倒霉的一年〉》,《参考消息》1980年12月29日,第1版。

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①

再次判断并确认苏联安全威胁的程度,对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其一,确认苏联不会入侵中国本土,论证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有一个可行的安全环境,从而为缓解备战和裁军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从间接回忆资料来看,此次谈话精神很快就“作为当时外事工作动态性文件和讲话在高层机关传阅、传达”,只是并未下达到军方;^②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既然苏联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那么,中国安全战略的重心开始由国土防御,转向凭借外交的反苏统战,破除苏联的战略包围压力。尽管后者依然需要军事手段的介入,但其对抗烈度和财政压力毕竟有别于直接的正面战争。简言之,外交手段从安全战略的辅助工具转变为主要手段。

对战略威胁的判断、安全战略重点和策略的变化,对中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提出要“消肿”,同年9月,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方案》,决定将军队员额裁减至450万人,^③但受到“文革”的干扰而未能如期完成。1977年12月,中央军委通过的《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肯定了1975年的精简整编方案,要求全军继续执行精简整编任务。^④但由于对苏联威胁的警惕,以及1979年军事回应苏联的周边战略部署,裁军任务让位于战备,部队不但没有精简,反而进行了扩编。进入1980年,源自1975年的裁军进程再次提上军委决策日程。1月下旬,军委就开始密集讨论军队编制体制问题。^⑤3月4—12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编制体制和压缩定额的问题,就精简裁军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685—686页。

②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457页。

③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9页;潘宏:《中国百万大裁军及其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60—61页;徐焰:《八十年的两次大裁军》,《党史文苑》2016年第17期,第4页。

④ 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22页。

⑤ 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1950—1990)》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390—393页。

题达成了共识。^①8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提出全军由603万人压缩为450万,精简整编工作从1980年第四季度开始。^②到1982年底,解放军总员额减至423.8万人。^③1983年,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任务完成,总人数缩减至400万人。^④至此,1980年代前期的裁军告一段落。

尽管裁军的本意在于精兵强军,^⑤但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的设想,折射出裁军与国家安全形势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才有了军队“消肿”的决策;^⑥正是因为不需要准备比边界作战更大规模的战争,才能告别战时扩编,进而裁军。由此,国家安全领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布局:一方面,中国在周边不断强化与苏联扩张势力的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在削减用于国土防御的军队存量。它间接反映出,决策者心目中的两类苏联威胁也在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苏联战略包围的威胁压倒了对华战争的威胁。由此,针对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与裁军就形成了紧密的负相关效应。每当中国在间接消耗苏联的反霸战线上有所进展,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缓解威胁的论断和裁军举措。

进入1983年,因对台军售而冷却的中美关系重回正轨。1983年温伯格访华,中美军事关系得以恢复。1984年1月,以中国总理访美为契机,上台三年的里根政府终于出台正式的对华政策,其标志为第120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⑦此后,中美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进入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阶段。1980年,中美合作经营阿富汗战场的时候,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缺乏现成的外交筹

① 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1950—1990)》下卷,第399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115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608页。

② 丁伟、魏旭:《20世纪80年代人民解放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回顾与思考》,《军事历史》2014年第6期,第53页。

③ 徐焰:《八十年代的两次大裁军》,第6页;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第22页。

④ 丁伟、魏旭:《20世纪80年代人民解放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回顾与思考》,《军事历史》2014年第6期,第5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681—682页。

⑥ 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4—285页。

⑦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Premier Zhao Ziyang,” January 9, 1984, pp. 1-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PR01513.

码和长期的经营积累。^① 无论是中国的援助、还是阿巴两国既有的抵抗力量、装备、军事素质,都难与苏军相匹敌。^② 但到1984年,中美已经扭转了这个劣势,中美巴阿四方经过磨合与政策协调,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援阿抗苏”工作机制:由美国总体协调与出资,中国等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巴基斯坦负责转运培训的合作模式。据巴基斯坦方面估算,阿富汗抵抗力量在1983年接收了一万吨的武器,并逐年增长,1987年增长到6.5万吨,其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中国。中国每年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军售额达一亿美元。随着苏联于1985年强化了对阿富汗抵抗压力的打击力度,美国也针锋相对,通过中国说服巴基斯坦转运“毒刺”导弹进入阿富汗,极大地打击了苏联空军。^③ 为解决阿富汗抵抗力量攻打喀布尔的需要,在中美专门合作之下,中国重开早已停产的单筒火箭弹。1985年,巴基斯坦就向中国开出了500枚火箭筒的订单,到1987年底,中国交货达到1000枚。^④

从1979年起,中国对印支半岛的政策就包括逼迫越南从柬埔寨无条件撤军。为此,中国在战略和军事上同时推进。战略上,通过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对抗侵柬越军,以打击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从根本上牵制苏联的战略部署,消耗苏联的国力。军事上,每当越南发起对柬埔寨的进攻,中国就在中越边境实施军事行动,以牵制越南军队的精力和部署,减轻柬埔寨游击队的压力。1984年11月,越南在泰柬边境对柬埔寨游击队发起旱季攻势。11月21日,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强烈谴责,^⑤1984年11月21日和1985年2月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May 21, 1978, 4:05-6:30 p. m. Meeting with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 447.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anuary 7, 1980, 9-11:45 a. m.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and Vice Premier Geng Bia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 S. State Departmen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pp. 1039-1040, 1061.

③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p. 137, 139.

④ Mohammad Yousaf and Mark Adkin, *Afghanistan: The Bear Trap*, New Delhi: Bookwise, 2007, p. 150.

⑤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强烈谴责越南当局侵略行径 坚决支持柬泰人民正义斗争》,《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2日,第1版。

12日,中国边防部队两次在中越边境发起作战行动,^①以牵制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②而中美在印支问题上的密切磋商与合作则有力支持了“间接消耗战略”。1985年2月24日,沃尔福威茨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吴学谦、副外长朱启祯进行工作会谈,讨论柬埔寨以及中越边境的冲突问题,要求中国增加对柬埔寨游击队的援助。^③3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和援助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④3月11—15日,李先念对泰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坚决支持泰国和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⑤可见,中美战略合作已经细化出工作级别的协调机制,并在情报和外交上有效强化了中国的间接消耗战略。

与此相同步,新一轮的百万裁军进程也开启了。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反霸政策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政策,由此可以排除战争的危险,“把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并决定再裁军100万,“减到三百万”。^⑥从1984年下半年起,总参开始着手制定裁军方案,并于次年形成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⑦在裁军方案酝酿过程中,对安全形势的判断成为必须被论证的前提。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高度,以“和平和发展”的命题分析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形势,^⑧并在6月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万裁军的决定。为论证这一决定,邓小平回顾了决策层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其演变过程:“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① 《外电认为我还击入侵老山地区越南将减轻越对柬抵抗力量的压力》,《参考消息》1984年11月23日第9443期,第1版;《外点评中国边防部队还击越南挑衅》,《参考消息》1985年2月14日第9525期,第1版。

② 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1950—1990)》下卷,第530页。

③ Jeffrey T. Richelson, e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 Engagement, 1960-1998*, Washington, D. C.: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9, pp. 54-55.

④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越南在柬泰边境加紧军事侵略》,《人民日报》1985年3月7日,第4版。

⑤ 《坚决支持泰国英勇抗击越军的挑衅和侵犯 李先念主席在炳·廷素拉暖总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3月13日,第4版。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608页。

⑦ 张震:《张震回忆录》下册,第268、270页。

⑧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页。

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①1980年代的第二轮百万规模的裁军由此开启,1987年4月4日,副总参谋长徐信宣布,百万裁军任务已经基本完成。^②

与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的谈话相比,对国家安全的两次判断并无实质性差别,但后者更具理论高度,在对外政策上产生的宣传效应更加明显,但也因此遮蔽了安全战略在1980年就发生的质变及其内在逻辑。对安全判断的理论化有其自身的动力和发展逻辑,与裁军工作遇到的困难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决策层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已经趋向缓和与乐观,并最终稳定下来。将战争的可能性推延到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排除了战争的威胁,也为裁军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从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讲话之后,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在政策上得到解决,但1985年的国家安全形势判断才在马列主义的范畴和理论高度修订关于战争威胁判断,使安全政策和现代化最终在理论和逻辑上实现了自洽。

结 语

安全威胁下降后,中国仍致力于改造以苏联或地区强国主导的周边地缘格局。一方面,中国仍在阿富汗和印支半岛保持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消耗;另一方面,“间接消耗战略”为中国带来了意外的战略收益,即苏联为摆脱负担,开始敦促盟友结束战争状态,从而使中国周边的地缘格局向着中国期待的方向演进。

1982年4月16日,中国开启对苏缓和和工作之际,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见到勃列日涅夫时带话: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③这“三大障碍”后来成为

①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

② 陈湘安:《人大会议举行第五次记者招待会 徐信就国防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军队裁减员额100万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恢复军衔制还需一段准备时间;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利国利民利军》,《人民日报》1987年4月5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815页。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①它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再是中苏之间的障碍,也间接表明中国在周边安全上的诉求:消除敌对国家在中国周边的威慑力。但“三大障碍”涉及苏联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政策,调整过程艰难而缓慢,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中国的安全诉求才迎来新的机会。

1985年4月18日,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同时,也是中国推进裁军工作的关键时段,邓小平首次对“三大障碍”进行先后排序: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苏联可以做的第一步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10月9日,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②这段话确认了印支问题在“三大障碍”中的首要地位。如果说中苏领导人会晤是关系正常化的标志,^③那么,印支问题就此成为关系正常化的唯一条件。它反映出中苏军事对峙已经不再是首要的威胁。^④至此,中国安全战略和反联盟策略又出现新的特征:“间接消耗战略”不仅对苏联及其盟友有战略性的消耗作用,还会因为这种消耗作用,迫使盟主约束盟友的行为。事实证明,尽管“间接消耗战略”没有导致苏联抛弃盟友,但沉重的负担已经迫使苏联敦促盟友结束战争状态,以缓解或终止苏联的负担。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就承认“三大障碍”已经成为苏联的负担,并试图加以摆脱。^⑤1985年6月底,黎笋访苏时,戈尔巴乔夫提出“若是苏联和越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那无疑会有助于亚洲和其他地区和平基础的加强”。^⑥1986年,苏联开始转变对“三大障碍”的态度。1986年,在苏共27大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话题。^⑦3月,越南首次提出从柬埔寨撤军的议题和时间表。^⑧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涉及了中国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041、1085—1086页。

③ 同上书,第1264页。

④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第506、507页。

⑤ 《阿富汗问题使戈尔巴乔夫伤脑筋》,《参考消息》1985年11月4日第9785期第4版;《苏不再无条件援助阿富汗》,《参考消息》1986年9月24日第10106期,第1版;《戈尔巴乔夫愿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惊人之举》,《参考消息》1987年3月17日第10277期,第4版。

⑥ 《戈尔巴乔夫和黎笋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85年6月30日,第6版。

⑦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⑧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第514页。

关切的所有议题:裁撤中苏中蒙边界军队、中苏边界谈判、柬埔寨问题,以及从阿富汗撤军问题。^① 1988年4月,美、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喀布尔政权签署了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在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并公开表示,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5月,越南表示,要在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5万、并在1990年前完成撤军。^② 在苏联的施压下,越南将撤军时间表不断提前,^③1989年1月份,越南向中国承诺,将于当年9月底从柬埔寨全部撤军。^④ 这标志着周边地缘格局向着中方诉求靠拢,也使中苏和中越的关系正常化取得关键性的进展。曾导致中国战备的中苏军事对峙则降格为并不紧迫的安全议题,直到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才开启边境撤军的安排。1990年4月24日,中苏签订《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⑤ 至此,“三大障碍”全部解决,在中国周边构成潜在压力或威胁的地缘格局得到重塑。

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矛盾是1980年代中国对苏安全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力,其解决的契机和实现路径则是针对苏联及其盟友而形成的“间接消耗战略”。苏联对华威胁及中国战备政策,既是“革命与战争”逻辑下可以自洽的世界观,也是军队工作的核心议题,在中苏恶性安全互动的加持下,拥有了牢固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使国防安全与经济建设在逻辑和政策上的矛盾凸显出来,但苏联及其盟友的扩张态势无疑使战备获得优先地位。南疆作战之际,“反霸才能使西方帮助现代化”的逻辑曾用来平息二者间的尖锐矛盾,也使中国此后的反霸斗争日益强硬。在无法精确判断威胁程度的情况下,“间接消耗战略”是中国应对苏联威胁的仓促选择和无奈之举。1979年是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又是强力对抗苏联及其盟友的一年。高强度对抗反而让决策者认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苏联战略包围优先于本土入侵的判断,缓解了安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政策矛盾,也塑造出中国内松外紧的安全布局。而在外线

①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第515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7—48页。

③ 《传越南修改从柬撤军时间表》,《参考消息》1988年8月28日第10802期,第4版。

④ 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7页。

⑤ 唐修哲、沈法良:《李鹏雷日科夫举行第二次会谈 中苏签署6项重要协定》,《人民日报》1990年4月26日,第1版。

消耗苏联及其盟友的战略,使苏联的战略包围也失去威胁性,决策层对安全判断终于稳定下来并上升为理论,由此既扩展了裁军工作,不堪重负的苏联对盟友的约束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安全诉求。

新中国历次军事斗争的共性表明:凡是敌对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接近中国,都会引发中国的军事行动或均势博弈。^①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本质上是对苏斗争烈度的调整。换言之,无论是否下调苏联威胁的判断,中国都会对抗苏联及其同盟体系,这是“间接消耗战略”贯穿1980年代的决定性因素。在两强相争和意识形态的加持下,冷战时代的结盟更显牢固,盟友也更易借盟主之威势而拓张寻衅。而间接消耗则以逆向思维解决了这两项难题,为反联盟提供了新的模式与实践。苏越结盟之初,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苏联将面临同盟牵连困境,这是中国在1978年外交孤立越南的重要依据。此后,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印支局势的应激反应,尽管并非为间接消耗做出的专门安排,但客观上改变了间接消耗的模式与强度。所以,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打击此后成为间接消耗战略的主要方式和工作内容。尽管中国精心改善的外交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对间接消耗战略是巨大的助力,但相比较之下,对手压倒性的优势、复杂的周边地缘格局,更彰显出决策者坚守地缘安全的决心和毅力。换言之,中国决策者坚决的战略意志塑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独特一面:在安全议题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作用要远远大于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塑造作用。这种经验影响着今天中国领导人处理安全议题的方式,中国在周边国家的重大影响力仍是一笔宝贵的外交遗产。

^① 牛军:《中国援越抗美政策之再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21—22页。

reflecting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roots,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brought about by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ld society, we conclude that the English School's conception of world society is a highly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which fails to provide a clear image of the world society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Indirect Attrition Strategy: A Re-examin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against USSR in the 1980s

Fan Chao and Wang Ke (83)

The Sino-Soviet rupture in the 1960s caused China's anti-Soviet war prepar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era, as China started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clear analysis of the Soviet threat forced China to keep its active war preparation. As a response to Soviet and Vietnamese aggressive movements in the late 1970s, China successively launched diplomatic lobbying and border warfare, which formed an indirect attrition strategy, i. e. wearing down the USSR by attacking its allies. Years of confrontation convinced Chinese leaders of the limits of the Soviet threat. China attempted to use the indirect attrition strategy to break the Soviet strategic envelopment, support resistance forces in Afghanistan, and start a process of disarmament. By 1985, Chinese leaders confirmed the USSR's limited threat and recognize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two issue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Soviet Union also began to restrain its allies' conduct in order to reduce heavy military and economic burdens.

America's Psychological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Cold War: A Case Study of the Asia Foundation's "Seed for Democracy" Project

Xu Zhuo (116)

With the inten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